中外

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　余子侠　主编

中俄「苏」教育交流的演变

张　纯
刘振宇　著
余子侠

山东教育出版社

Участие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арене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Изменения в Японии Обмены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Продв
и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Обменов в област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азвити
е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обменов　Развитие обмена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ЕС　Эволюция управления заморских образо
вания　Китай и Россия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развитие образовательных обменов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

中俄(苏)教育交流的演变

余子侠　刘振宇　张　纯　著

山东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俄(苏)教育交流的演变/余子侠等著. —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10
(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
ISBN 978-7-5328-6259-7

Ⅰ.①中… Ⅱ.①余… Ⅲ.①教育—国际交流—教育史—中国、俄罗斯 Ⅳ.①G51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00111 号

中外教育交流研究丛书

中俄(苏)教育交流的演变

余子侠 刘振宇 张 纯 著

主　　管:山东出版集团
出 版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济南市纬一路 321 号 邮编:250001)
电　　话:(0531)82092663 传真:(0531)82092661
网　　址:http://www.sjs.com.cn
发 行 者:山东教育出版社
印　　刷:
版　　次:2010 年 月第 版第 次印刷
印　　数:
规　　格:787mm×1092mm 16 开本
印　　张: 印张
字　　数: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328-6259-7
定　　价: 元

(如印装质量有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总　序 …… 1

第一章　中俄教育交流的发轫与初成 …… 1

第一节　教育交流的前奏:元至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 …… 2

一、元代的中俄关系 …… 2

二、明代的中俄关系 …… 6

三、清代前期的中俄关系 …… 9

第二节　中俄教育交流的里程碑:俄罗斯文馆的办理 …… 12

一、俄罗斯文馆创立的背景 …… 13

二、俄罗斯文馆的建立与发展 …… 27

三、俄罗斯文馆的组织运作与教学活动 …… 34

第三节　清末民初的中俄教育交流 …… 43

一、“随使游历”与派遣学生留俄 …… 43

二、建立各类俄语教育机构 …… 54

三、沙俄在中国边疆地区的教育活动 …… 71

第二章　民国时期的中苏教育交流 …… 78

第一节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留苏教育 …… 79

一、留苏热潮的时代背景 …… 79

二、留苏学生的派遣过程 …… 81

三、留苏学生的留学情况 …… 106

第二节　国民政府治辖下的中苏教育交流 …… 117

一、苏俄教育思想的译介传入 …… 117

二、苏联支持下的军事教育 …… 122

三、民国时期的俄语教育 …… 125

四、其它领域的教育交流活动 …… 135

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苏教育交流 …… 148
一、中共教育事业的苏联影响 …… 148
二、留苏教育的延续 …… 159
第三章　共和国初期的中苏教育交流 …… 167
第一节　建国初期中苏教育交流的演进程序 …… 168
一、历史准备 …… 168
二、热潮初起 …… 172
三、“蜜月”欢度 …… 174
四、热潮遽退 …… 177
第二节　建国初期中苏教育交流的主要内容 …… 179
一、两国留学生的互派 …… 179
二、两国教育团组往来 …… 188
三、苏联教育专家来华 …… 191
四、苏联教育书籍译介 …… 203
五、两国高校校际交流 …… 209
第三节　建国初期中苏教育交流的时代特点 …… 211
一、不对等性明显 …… 211
二、政治色彩浓烈 …… 212
三、全方位的渗透 …… 215
四、由反思而批判 …… 218
第四节　建国初期苏联教育对中国教育的影响 …… 219
一、新型学制的确立 …… 219
二、教育内容的更新 …… 226
三、教学组织与方法的改进 …… 228
第四章　“文革”至苏联解体时期的中苏教育交流 …… 229
第一节　历史背景与中国有关政策调整 …… 230
一、中苏关系背景的变换 …… 230
二、中国留学政策的调整 …… 234
第二节　中苏教育交流的复苏轨迹 …… 240
一、中苏教育交流的中止期(1967－1982) …… 240
二、中苏教育交流的逐渐恢复期(1983－1988) …… 243
三、中苏教育交流的正常发展期(1989－1991) …… 246
第三节　中苏教育交流的主要内容 …… 249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一、留学人员往来…… 249
二、教育团体互访…… 252
三、教育书籍引译…… 255
第四节 中苏教育交流的时代特点 …… 259
一、通过“间接”了解苏联教育来打开局面…… 260
二、语言文字学习是教育交流的突破口…… 265
三、高中等教育层面为教育交流主流域…… 266
四、政府官方交流是教育交流的主渠道…… 266
第五章 苏联解体后的中俄教育交流 …… 268
第一节 中俄教育交流的历史背景 …… 269
一、中俄政治外交关系的建立…… 269
二、中国对外教育政策的完善…… 270
第二节 中俄教育交流的进展趋向 …… 279
一、中俄教育交流的上升时期(1992—1999)…… 280
二、中俄教育交流的发展时期(2000—2005)…… 282
三、中俄教育交流的提速时期(2006—)…… 285
第三节 中俄教育交流的主要内容 …… 287
一、两国留学生的互派…… 287
二、教育团组及人员的往来…… 291
三、译印苏俄教育书籍和研究苏俄教育专著…… 294
四、语言文字交流与学习…… 297
五、高校展与高教论坛…… 300
六、中俄大学校长论坛…… 302
七、中俄大学生艺术节…… 303
八、中俄中小学生夏、冬令营 …… 306
九、两国高校间联合办学…… 308
第四节 中俄教育交流的主要特点 …… 311
一、自费生为留俄生主体…… 311
二、教育交流渠道多样化…… 312
三、教育交流领域多层化…… 313
四、教育交流内容多元化…… 314
主要参考文献 …… 316
后记 …… 335

总　序

余子侠

教育，使人类社会走向文明且日益进步；交流，使教育事业得以创新而不断发展。作为人类一种古老而又弥新的文明，中华文化正是通过教育交流而得以形成、发展、更新和播衍。纵观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教育交流，既有将自身现有的最先进文化推向世界的活动，亦有从其他先进的国家或民族摄取自身亟需的文明因子的行为。在这种传输与求取、播衍与认同人类新知的过程中，中华民族通过种种途径一直未曾停歇教育交流活动，并且借助这种活动来逐步推进人类文明的世界大同。

一

从有人类在中国土地上活动并形成社会以来，尤其自学校教育产生以后，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演进，中华民族的教育交流在不断地推进和发展。这种人类社会特有的文化活动，若以中国自身为定点测其流向，则应包括顺向交流、逆向交流和互向交流三大类型。又由于交流过程中各方流量的不同和成分的变化，致使这种以主导方向为标志的类型划分，常常呈现一种冲激互融的交流态势。

所谓顺向交流，是在教育领域以中国为定点，通过相应的渠道或途径，将自身处于先进地位的文明因子和文化成分，传输给其他的国家或民族的交流活动。这种教育交流活动发生时，中国与其交流的国家或民族处于一种传授与收受的不同地位。换句话说，就人类社会最先进文化知识、科技发明以及社会进步的求取与认同来看，在此种教育交流活动过程中，往往其时的中华文明处于一种上势地位或先进势态，中国是文明的传输者和授予者，与其交流的国家或民族是对中华文

化进行一种接收、借鉴、吸纳或认同的活动。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这种教育交流类型在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时期表现较为突出，其时通过接收国外学子来华留学，中国书籍在域外的传播翻译，中国士子学人成为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传道授业之师，中华文化由是播衍到其他的国家或民族区域，成为他国借鉴的模式和学习的样本。

所谓逆向交流，则是通过种种教育交流的渠道，中国作为一个文化接受者，将自己亟需的其他国家或民族的先进文明因子和文化成分吸纳或引进国内，再结合国情所需融解于自身文明之中。这种教育交流活动发生时，中国与那些拥有先进的文化科技或思想制度的民族与国家相比较，处于一种时代的下势地位，其时中华文化在人类文明进程中处于后进势态。对与其交流的国家或民族而言，中国是一个接纳或收受者，其时教育交流的路径或渠道，大多表现为聘请外人来华任教，派遣学子出国留学，借鉴法式出国游历考察，博采新知译介他国著述，甚至一定程度上接受外人在华办学等活动。这种教育交流的目的和功效，乃在于借石攻玉以利取法教育变革发展的精神、内容与范式。这类教育交流活动主要发生在进入近代社会后一个半世纪的历史时段中。

至于互向交流，即中外教育交流过程中，既有华夏文明或中华文化通过相应的教育交流渠道传输到其他国家或民族，又有他国文化或他种文明被引入中国的教育领域之中。其时教育交流的双方，各有对方可资借鉴和吸纳的文明因子和文化养分。当然，这种教育交流并非一对一的对等交换，更非以强凌弱地硬性传输，而是立足平等的地位互相取长补短，依据文化互利的原则各取所需。值得说明的是，这种教育交流类型的出现与形成，从人类历史进程来看，是当“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过程的时代产物，是走向世界一体化和实现教育全球化过程中的历史现象。其中教育交流的历史背景是将世界教育的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步视为一个整体，在交流的两极中，中国自然为一极，但另一极并非应然为某一固定的国家或民族。也就是说，这一时期中国通过教育交流可以吸纳一国或多国的文化养分，也可以将自己先进的文明因子传输给正为自己吸纳养分的对方，但更多的是传输给那些文明进步和文化发展与中国相比处于后进地位的其他民族或国度。这种类型交流活动在当代尤其本世纪以来的中外教育交流进程中表现尤为明显。

上述三种教育交流类型只是以一种静态的视点相对而言，其实无论哪一个历史时期，中外教育交流的文化内容及活动方式都不是一种类型活动在发展、在进行，而是顺向交流时也有逆向交流成分，逆向交流时也有顺向活动内容，或者互向交流发生时一时顺向成分占优一时逆向成分偏重。这不仅因为人类各大文明互

有长短，文化各有优劣，任何时候交流的双方予对方都有自己的可取之处，相应地交流双方都有借鉴和吸纳对方优长之需，而且由于教育交流双方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国际地位都处于一种恒动而非恒定不变的状态，因此在借鉴和吸收对方先进的文化成分或积极的文明因子时，也将自身文明和文化的优良部分传输给对方，或者反是，即在传输的过程中对对方的优良部分也有吸纳与借鉴。如若求其区别，只是态度方面的积极与消极，作为方面的主动与被动，流量方面的充沛与弱小，以及交流时选择的层面与领域的不同。即使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两个最为明显的“一边倒”历史时期，即隋唐时期中国与东亚各国的教育交流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外教育交流领域“苏东波”现象的出现，也绝非仅仅只有中华文化向东亚传输或中国全盘借取苏联文化教育这种“要单边”的活动，而是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内中国有所取也有所予。

二

在漫长数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中华民族的教育交流活动不仅持续不断、源远流长，而且其交流渠道和活动形式变换多样。虽说就教育交流的对象而言，大致可以归划为人的活动和物的流动，即在教育领域中社会主体的交往行为和文字载体的输传来往；若就活动方式和交流渠道或路径而言，自有教育交流活动降及今日，则包括留学生的派遣和接收，教师的引聘和派出，相关文字资料（诸如书籍、报刊）的译介与取用，相关人物的教育访察及学术传输，有关教育团体的参与及其会议举办，有关组织与个人的设学授徒，以及当今时代的影视与网络的输送与接收，如此等等。并非自教育交流活动产生以来就均有所开启和展现，而是随着文明的演进和社会的发展逐渐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

就教育交流的主渠道之一翻译而言，这种活动发端甚早。据《礼记·王制》记叙：“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达其志，通其欲，东方曰寄，南方曰象，西方曰狄鞮，北方曰译。”这段文字不仅揭明后世所言翻译人士为“象寄之才”的称谓之源，而且表明中国最迟在西周时期已有从事翻译工作的专职人员以及进行翻译的活动。当然，根据人类文明进步的程序和文化教育发展的水准，其时的翻译恐怕只是作为语言交流桥梁的口译。这类口译活动，如果作为官方交往的信息传递，必有其语言转译下的文字记载。正如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所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手段”。而作为记录和传达语言的书写符号——文字，是扩大语

言在时间和空间上交际功用的文化工具。这两者在促进人类文明方面起着极大的作用，是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间文化交流或文明交融的主要媒介。没有语言文字作为中介，人类的不同国度、不同种类、不同民族间的交流就无从谈起。这种语言翻译进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随着文明的进步和教育的发展必然会逐渐引带出文字翻译。据史籍记载，中国最迟在汉代就有文字翻译活动，其中最为肯定的事例无过于东汉末期对佛经的翻译。而佛教的传入并由其引发的寺院教育，正是魏晋以下一个时期内中国的一种特殊形式教育，其组织方式与教学方法对后世中国的学校教育尤其书院的兴起与发展产生着重大的历史影响。

与翻译活动一样，教育交流的另一主要渠道留学，在中国历史上同样早有发生。在中国古代，留学被称为游学，而这种教育交流活动的最早历史记录可从甲骨文中寻其端倪。据甲骨文的研究成果，《龟》2.25.9 有此卜辞："丙子卜、贞：多子其𢀛学疫，不冓大雨？"其辞义是问一群学子去"疫"地方求学会不会遇上大雨。显然这种求学活动不是在本地进行，而是从甲地远赴乙地去拜师受教的举措。降至春秋战国时期，穿越各诸侯国界的游学活动更是时有发生，无论是孔门之徒七十子，还是"充满天下"的墨家弟子，无论是"从者数百人"的孟轲，还是从游者寡的庄子，各家私学学生中均不乏远道跨"国"游学之人。如果说上述游学活动还只是发生在今日的中国土地上，那么降至两汉，匈奴贵族子弟前来汉王朝中央官学拜师问道，无疑与今日所言的"留学"活动毫无差异。自是而后，外人来华留学活动实繁有徒。而华人出国留学的教育活动，自明清而后更是屡屡有之。

教育交流又一条主渠道是教师的引聘和派出。前者是聘请外国人来华传知授教，后者是国人走出国门讲学作师。这类教育交流活动亦源自上古，据史籍传述，周文王姬昌之师就有来自方国的鬻熊，而史籍更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以及"幽厉之后""畴人子弟"散在"诸夏""夷狄"的记载，由是春秋战国之际诸家私学蜂起。至汉末三国时期，前有国渊、邴原、管宁等避乱辽东"教授之声不绝"，后有虞翻"罪放"岭南而"讲学不倦"，这种学随师迁的文化传播方式自然促成教育交流圈的不断扩延。其如儒学文化由辽东而外向推进，于是有了后来的百济国汉学家阿直岐与其"邦之秀"王仁前往日本为师。当然，中华衣冠出国为师者影响最显、声誉最扬的人莫过于明末清初的朱舜水。据王韬《扶桑游记》称，朱氏在日本 20 余年间收徒讲学实开近代日本"文教之先声"。及至鸦片战争之后外人来华为师，尤其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聘请洋师的活动更是日渐频繁。

比较前述几种渠道而言，跨越国境的教育考察及学术访问，前往他国从事办学授徒活动，以及国际性教育团体及其会议的举办与参与等，则是进入近代社会

以来才有所开辟的教育交流路径。就在中国转而聘请外人来华为师从教之际，伴随社会转型与教育变迁，教育考察参访活动亦在近代中外教育交往过程中开始发生。这条新型而又重要的教育交流渠道自晚清开通以来，随着新式教育的变革和发展，尤其在教育走向国际化和全球化过程中，日益得到人们的重视而得以不断拓展。身入他国进行办学活动，包括有关组织和个人设学授徒这种渠道，就中国而言亦是近代社会才有的事情，而且与出国从事教育考察参访活动有所不同，近代外人来华办学是在一种国际地位极不对等的情况下的强力所为，当这种活动越过设限而侵犯到国家教育主权之时，教育交流也就变味为教育侵略了。只有在国家主权得到全方位的保障之时，这种教育领域的活动才有了真正的教育交流的意味，如今日孔子学院在各友好国家的出现以及外人投资中国进行合作办学。至于国际性教育团体及其会议的举办与参与，若就中国作为主体投身其中而言，最早的活动可追溯到清末宣统年间。这种教育交流的渠道及其相关活动，真正得到国人的重视是在民国时期，而且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利用国际教育组织及其会议这种国际舞台从事教育交流，已经成为一条日益重要的交流途径了。

在现当代的教育交流活动中，开发最晚但其势最盛的渠道，无疑是影视与网络的接收与传输，而且这是一条最科学、最经济、最便利、最广泛的教育交流渠道。严格地讲，这一方面的教育交流无须教育者直接活动其中，但它所给予的教育信息和发生的教育影响可能是一种最大量。其中借助电影进行教育交流，其历史踪迹可追溯至20世纪二三十年代，借助电视进行教育交流，则迟至20世纪七八十年代，网络的接收与传输的起始时间就更晚，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当代”事物，它伴随着科技化、信息化时代而到来，又伴随着这个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地创新和发展。

总体而言，检讨中外教育交流渠道的开拓与发展，可以看出这些渠道的出现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每条渠道的开掘及其相关教育活动的开展，都是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在一定历史阶段上产生某种文化需求的时代之必然。

三

无论通过什么样的形式或由哪一种渠道发生的教育交流，其活动对于交流双方而言，基本上都发生这样的演变程序：此类活动的发起或组织，活动过程的具体运作和经过，以及活动发生后对交流国家、民族或地区所产生的实际影响。在这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些影响中，最直接的社会领域自然是教育尤其学校教育本身，但从整个人类社会发展历史的长远景观来看，最深层次的影响应该是文化的变迁和文明的演进。循此认识路向来考察教育交流活动在中国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尤其对中华文化的形成、发展和变衍而言，可以将中国历史上迄今为止的教育交流活动大致划分为四个历史时期或时段。教育交流在这四个历史时段各有其主要渠道和特殊的表现形式，而且这些时期的教育交流对中华文化的演进产生着各自不同的历史影响或作用。

在历史学界所认定的先秦时期，其时的教育交流活动主要发生在今日中国版图显示的区域内，其总体特征表现为中华境内各处文明或文化原初发生点之间的交流与融合。据考古学探掘和研究，今日中国境内的原始文化遗址已达六七千处，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相信这种原始文化遗址不会少于万数。而就今日意义的教育交流而言，这种活动自然发生在文字形成和学校产生之后。即使如此，中国文字（主要指汉字）的成型与学校的产生最迟也在“五帝”末期，而正式以文字记载历史已被确认自夏朝开始。由是可知，教育交流活动在“三代”应是一种非鲜见的社会现象。其时的教育交流活动，从其地域发生来看，若以周王朝建立后分封诸侯为界，则此前为中原王朝与方国之间，此后为周王朝中央及诸侯国之间的“流动”；从其交流渠道来看，应以身怀知识技艺具备“师”之角色功能的人奔走游学为其活动主体。尤其在周王室一次次“失官”之后，这种教育活动现象更为明显。降及春秋战国时期，诸如“儒者西行不到秦”（主要指其前期人物）、“墨突不黔”的历史记载和文献表述，无一不显示其时“士”阶层游学（无论是文化知识的传授或是文化知识的求受）活动的频繁，而且在战国中后期，从“学富五车”、“后车数十乘”的历史话语中，人们可以探知其时游学之士是带有“书籍”（典册）这类文字的载体。更重要的是这一时期出现的稷下学宫，显然是这种教育交流活动的合水处，也是先秦时期中华域内各种文化的交汇点。它的出现及其教育功能，从一个侧面显示出中华文明有如天文学界所说的星际云不断地凝聚收缩而成恒星，通过长时期的交流与融合，“先秦时期”的教育交流最终促成华夏文化的成型。

比较第一个历史时段先秦时期教育交流有助于华夏文化的凝聚成型，自秦而下的第二个历史时段即史界所定的封建社会时期，教育交流主要表现为中国与周边国家或民族之间的种种交往活动，其历史作用与影响则是通过教育领域的中外交流而推动东方儒学文化圈的形成。在秦汉时期，先期成型的华夏文化经过了一个较短时期的内在成分的调整，最终在西汉前期形成了儒学主导兼容百家的中华文明，也即从此时起教育交流开始成为中土与外邦之间的“人的活动”与“物的流

动”。自是而降两千年间,中外教育交流的主要渠道和活动形式,一是对外邦来华留学生的接收培养,一是中华书籍在外邦译介传习。当然,在这一历史时期的前期,教育交流还承续着历史的惯性而部分地完成着先秦时期的任务,即继续在今日中华版图的区域内实现华夏文化的凝聚,而从整个历史的走向来看,这一历史时期更多的是在向周边民族和国家传输着中华文化,尤其在中后期更是这样,于是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造成了一道独特的亮丽风景——通过教育交流使东方儒学文化圈在中土与四邻之间紧密地联成。这种文化圈的形成过程有如投石入水掀起的波纹,其圈层呈现的图景是由内而外、由小而大——先在华夏各族生活的区域再扩展至域外友邻。

就在中华文化通过教育交流不断地传输四邻之际,在明清时期,以工商经济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始借助基督教传教士的来华活动对中国产生一定的渗入性影响,由是东西两大文明开始有了历史性的碰撞。这种渗入与碰撞经过起自鸦片战争的西力东侵的推动,以西学东渐的形式引发中华文化与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文化发生人类文明史上最大、最全面的冲击与调适。于是作为文化交流的主要组成部分和重要发生领域的教育交流,中外之间的相关活动出现了换位式的流向变异,而且在这种教育交流过程中主客体之间借以活动的渠道也有了新的开掘。近代以来,诸如留学教育的兴起与发展,外籍教师的聘请与借用,西学书籍的引介与翻译,出国考察的组织与派遣,国际教育组织及其会议的参与与举办,以及相关教育人物来华的教育访问与学术传输,甚至包括外人借助强力的支持来华兴学。如此等等,不仅表明近现代中外教育交流发生的途径或渠道有了前所未有的拓展,更重要的是显示这一历史时段教育交流的主流已在流向上发生了逆转,此际中国已成为一个文化接收者,在一种后进势态的位置上,引进或吸纳西方文明的先进因子用作自我更新的文化养分。尽管这种引进与吸纳有过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阵痛,其程序也经过了抗拒排斥到被动接受再到积极吸收的演进历程。于是在这中外教育交流的第三个历史时段中,对于中华文明的演进或中华文化的发展来说,教育交流所生发的历史作用,主要在于借助对西方文化的吸纳而重整自身体系结构和更新自身机体养分。

经过长达一个半世纪的冲突与融收,中华文化有了前所未有的调适和整合,在自身国力不断增长和世界格局不断变化的时代环境中,其在中外教育交流领域中有了新的展现。这种历史性变化可以从 20 世纪末尤其新世纪到来后中外教育交流显现的种种现象窥见端倪。若就教育交流的渠道来考察,新一轮中外教育交流并没有开拓出更多的新路径,最明显的变化仅在于伴随着科学化、信息化时代

的到来，网络传输在教育交流中越来越发挥其重要的作用。但从教育交流的流向以及相应的流量之变化，可以看出中华文化正在借助种种教育交流活动走向世界，从而开始形成第四个历史时期——在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趋势中，随着教育日益全球化，中华文化也在日益走向世界，并在东西文明交融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历史推进作用。就教育交流的流向来看，近 20 年来，虽说作为交流的一方，中国仍处于一种逆向交流为主导的国际地位，但顺向交流的成分在日益增长且长速甚快，诸如走出国门办学收徒，中国书籍为他国译介取用，外国来华留学生的快速扩增，对国际教育组织的积极参入及国际教育舞台上话语权的增添，所有这些表明中国的教育交流已开始转向为一种对外互向交流的时代。这种时代表征还可从量的变化获得取证材料。诸如来华留学生不仅总量上增长甚大，而且在国别上也日益添加；国人出国访学、授教以及参加相关教育组织与会议，在今日中外教育交流领域也已成为一道繁荣而亮丽的风景；中华文化的文字载体（尤其是书籍）也逐渐在各友好国家莘莘学子的案头占有一席……

总体而论，从中华文化形成与传衍来看，教育交流可划分为四大历史时期：第一时期促成了华夏文化的成型，第二时期促进了东方儒学文化圈的形成，第三时期推动了中华文化自身的变革和更新，第四时期在于促进中西文化的融合并推动人类文明形成全球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和环境。当然，在这四个不同的历史时段中，教育交流发生的积极作用有所不同。相较而言，古代教育交流其中文化意义大于教育自身的意义，而近代以来的教育交流显示的积极作用更多的表现在教育领域或教育自身，但不论何时何类教育交流，都关乎着中华文化自身的变化及其在国际社会中的展现。又由于文化及其传衍变异不可秤称斗量，所有这些只是一个“概数”，这些时期或时段只是一种“基本”的判定、“大致”的划分。正如前述，在第二历史时段的初期，教育交流还在发挥促成华夏文化圈成型的功能，同一历史时段的末期，即自明末到清代前期，一方面教育交流还在发挥着形成东方儒学文化圈的作用，一方面又在自觉不自觉地接触着西来文明。与此相应，这种教育交流对中华文化的积极作用，即使在同一时段中也有另类现象的发生，如在第二历史时段中，曾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内引入了传统意义上的“西方”——来自古印度的佛教文化。加以如此等等说明之处，无非表明笔者的相关论断只是用一种极为宏观的视野来判定教育交流的历史推进作用和文化传输功能。

四

毫无疑问，从文化传输功能来看，教育交流无疑是缘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世界各民族文化多元化的历史需要；就历史推进作用而论，教育交流无疑是促进人类社会全球一体化的必然选择。因此，任何民族、任何国家若欲求得自身文化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仅进行对外教育交流不可或少，而且随着以科技化、信息化为其标识的世界一体化时代的到来，这种人类特有的文化活动愈来愈成为一种国际交往的常态。就中国而言，这种在国际舞台上交往的常态，从古至今尤其进入近代社会以来，更多的表现在中日之间、中美之间、中欧之间以及中俄（苏）之间的教育交往，因此本书系以此四个国际方面的教育交流活动的历史总结作为构建体系的四大支柱，这不仅符合中外教育交流的历史实际，而且这种研究于探究中外教育交流的发展规律应该是最具广泛性和最有代表性的选材。又因为自古以来中外教育最为重要的渠道或途径，亦即显现最多的形态乃在留学教育，而且这一领域的活动实为整个教育交流事业的大宗，故而笔者在组织本书系时将近代以来中国对于留学教育的管理，作为第五个方面选题的安排。至于中国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教育组织及其会议上的种种活动表现，可以看做是在同一时间和场所中国与世界各国的一种整体性交往，而且这种交往随着世界格局的新变化越来越成为一种频繁的交流形态，缘此而成为本书系又一撰研题材。

就中日教育交流而言，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教育交流活动发生最早亦最为频繁的国际领域。本题材撰研者赵霞副教授曾作为国际交流员在日本国地方政府外事部门工作，现为湖北大学日语系主任。现在成书的文字，是她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加以修改和丰富而成。该书在撰修过程中，立意描叙恢复邦交正常化以来中日两国教育交流的大致情景，对双方教育行政机关主导下的教育交流以及非教育行政机关主导下的教育交流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同时为了读者能够对古今中日教育交流有一个全方位的历史性了解，进而探窥东方世界两大邻邦教育交往的运行规律，故于邦交正常化以前中日教育交流的历史进行了事理简明的回顾，并对新世纪以来两国教育交流的发展趋势进行了见解独到的总结。

与中日教育交流有所不同，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发生的历史尚不及两百年，这自然与美国自身的历史不长有关，但更重要的是缘于两国地理位置，人类社会只有发展到一定的历史时期才能使远隔重洋的两大民族发生实际接触与交往活

动。然而仅就教育领域而言，两国间的交往于中国方面无疑是逆向交流成为主流方向。放眼世界格局的变化，自“一战”以降近一个世纪来，美国的教育在世界各地产生着重要的影响，中国亦不例外，故而中国于教育上通过交流更多的是借取或获得。考虑到学术界既有研究以及本书系撰研主旨，该书作者接受任务后以中美建交以来的教育交流作为研究的重点。他们不仅英语水平相当不错，而且撰研人员中有人还曾作为访问学者在北美的土地上“交流”了一定的时日。

关于中俄（苏）教育交流，若就近代以来苏俄的社会变化可谓一波三折，不仅国家政体如此，而且国家名称亦然。而在中俄（苏）两国真正发生教育交流的历史过程中，中国社会也是一身三变——由清王朝而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有鉴于此，尽管组织编撰本书系的初衷乃在于重点介绍和总结新时期以来的中外教育交流，故于这种教育交流史的研究坚守史学“薄古厚今”的撰研原则，但于中俄（苏）之间的相关历史活动，我们还是从头“细数家珍”，以利为读者提供“全面了解”的素材。在这一选题的研究中，名为三人合著，实则俄语俄文能行的刘振宇用力最多。

比较前述三题专就一国与中国的教育交流而论，中欧教育交流的研究则以西欧诸国为其对象。作为这一课题的主要撰研者，以法语为第一外语的李兴业教授不仅多次往来欧陆，而且借助武汉大学丰富的藏书，使他们的研究较为得心应手。尽管对中欧教育交流深远的历史背景有所掠影，但为了扣合书系的撰研主旨，这一选题写作的更多笔墨是发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三十余年间。当然，对西欧诸国与中国的教育交流，活动较多、意义较重是在英、法、德等国。同时为了使读者明晰中欧教育交流的活动重点和变化动向，对中国与欧盟教育交流，作者情有独钟地给予了较大篇幅的安排。

不同于国与国之间的教育交流，让中国教育在国际教育论坛或舞台上得到合适的展现并由是为中国在国际教育领域争得一定的话语权，显然这种中国积极参与国际教育组织及相关会议的活动是一种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的“整体性”教育交流。于中外教育交流研究而言，这是一个新的层面、新的渠道、新的领域和新的视角的研究，因此作者兰军副教授在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进行了丰富史料、拓展范围、完善体系的修改，力求将一幅自近代以来中国走进国际教育论坛后种种教育展示的全图献给读者诸君，以利人们对中国教育过去如何走向国际化以及今后国际化走向如何有一个全方位的了解、思考和探测。

至于冉春博士以自己的学位论文为基础完成的中国留学教育管理研究，则是依据历史的线性发展，将近代以来中国于留学教育（主要指国人出国留学）有过真

正的管理(尤其设立专门负责留学教育管理机构以来的)活动,进行了全程扫描和全面总结。只是考虑到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已然不少,故而主要文字放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和共和国时期的八十年来。通过他的研究文字,读者不仅可以明晰在中外教育交流过程中留学教育这条主要渠道的价值所在和作用所在,而且可以窥见近代以来中外教育交流的大致演进历程和演变规律。当然,作者在对这一专题进行撰研时,也始终牢记着胡适先生的成理之言:“一国之派遣留学,当以输入新思想为己国造新文明为目的”;“留学者之目的在于使后来学子可以不必留学,而可收留学之效”(胡适《非留学篇》)。由是而观今日浪激波翻的留学之澜,相信人们通过本书系更加认识到确有必要对中外教育交流进行真切的反思、总结和检点。

收笔于庚寅年夏至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